



除了快递小哥，在现代社会中存在感越来越强的还有外卖员。近年来，在全国两会上，始终不乏围绕他们的提案。在保障快递和外卖从业人员劳动权益的呼声之外，也有更多代表和委员关注到一个新角度——算法。

2020年，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曾在全网引起热议。算法对于当代“打工人”的隐秘控制，开始被公众反复讨论。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黄超提出相关建议，希望通过改变算法规则，督促平台设计抛物线型单价调控机制。例如，当骑手每日在线接单达到一定数量后再接单，配送提成将随之下降，进而在整体上控制骑手群体的劳动强度。

如何正确认识算法，利用算法，在算法包围中尽可能地保护个人信息，在当下影响着数据社会无数个体的日常生活。

重新认识算法

从前些年的“大数据杀熟”到之后的外卖员“被困系统”，算法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愈发普遍。一方面，算法无疑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对政府基层治理的效能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算法也给经济社会秩序、权益维护、价值观带来重重隐患。

重新认识算法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在一些业界人士看来，首先要意识到从情感的朴素认知上觉得自身受到算法的“损害”或者侵权，到真正利用法律武器找算法的生产者“讨个说法”，这中间存在一条明显的鸿沟。

“近年来我们发现，真正在法院形成裁判文书的算法案例大多发生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至于大家经常在网上看到的所谓‘案例’，比如有网友表示自己被大数据‘杀熟’，很多只能算作场景。”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新宇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

记者查阅一些近年来由杭州互联网法院判决的典型案例发现，案例多涉及不同互联网企业之间通过算法进行不正当竞争。

刘新宇提到，如果算法涉及的双方是普通消费者和开发应用算法的互联网企业，作为个体的消费者很少能够因为算法侵权而与对方走上法庭，其中要经历“三个阶段”。

“在一些常见场景中，个体消费者在使用某个App时意识到自己被算法歧视，比如平台根据他的消费行为记录，只给他推荐某一个价格区间的商品，然后他发现这一点，觉得自己被歧视，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认知。之后如果消费者想要借助法

律武器对此维权，首先他可能不会很笃定法律是否支持自己，其次大部分人都有正常工作，是否有足够时间精力为遭受这种歧视去斗争到底，这些都充满不确定性。”

在刘新宇看来，即使消费者自身有足够的精力和意愿为算法维权，亦在法律上得到支持，也很难最终走到诉讼或是判决阶段。“如果消费者或者用户，经过前两个阶段，即情感上受到伤害，法律上又能够站得住，把企业起诉到法院。对方也会评判，这次起诉中自身可能败诉风险比较高，不想让生效的判决出现，那么就会通过赔偿等形式进行调解。消费者买机票被‘杀熟’买贵了，那么平台提出赔偿5张机票，甚至10张机票，大部分人到这一步往往也就接受了调解。同时，消费者作为弱势方，其在取证、质证等诉讼环节中较互联网平台更为弱势，这也导致其更愿意接受与平台进行调解。”

在采访中，刘新宇还通过一个最新场景进一步说明了普通人针对平台算法进行举证和搜集资料的难度。2022年，一位法学专业的年轻女生找到刘新宇和同事，起因是她认为自己遭受了网络暴力，而网暴来源于社交平台的算法。

“这位女生平时喜欢跳舞，也会在某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些跳舞的视频。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视频的点击量都很普通，可能平均只有几百，但是女生也不在意这些，她只是想要分享日常跳舞。突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一条最新的跳舞视频‘火’了，点击量和评论数是平常的几十倍。还没来得及开心，发现评论里出现一些污言秽语，很多人说她是‘打擦边球’。她自己推测是平台利用算法给这条视频加上了‘擦边球’标签，并且精准推送给那些想看‘擦边球’的用户。”刘新宇说道。

对于这一场景的咨询，刘新宇和同事进行了内部讨论，认为平台所有背后的逻辑、算法和标签，都难以取证。他告诉记者，“我们现在提到算法，常见的表述是‘背后的算法’，为什么要强调算法总是在背后呢？因为这些算法看不见，摸不着，难以固定取证。在传统刑事案件中，受到伤害的人可以去专业机构验伤，进而取证。在数字时代，有一些电子证据可以固定，比如网页代码，用户的粉丝数量变化，或者一些聊天截图。但是算法和这些都不同”。

上述算法的特性与现实复杂程度，共同导致目前的算法治理存在“打地鼠式”的困境。在立法层面，我国将算法推荐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但该规定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算法应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数据赋权、算法透明度规则、算法解释规则也面临“可